

胡適在「歧路」上

李達嘉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受矚目的人之一。他對文學革命以及思想革命所作的倡導，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樞紐地位。由於他在這方面的影響已經形成，而且開啟新門徑的意義極為明顯，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表現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相對而言，他在五四運動後期頗費心力地創辦了《努力週報》大談政治，所受到的注意顯然要少得多。他自己曾經說談政治是他的「歧路」，在《努力》停刊時，也說《努力》裏最有價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政論，而是他們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批評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以及在《讀書雜誌》《努力》附刊裏討論古史的文章；他深信「《努力》將來在中國思想史上占的地位應該是靠這兩組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①這段期間他在《努力》上所發表的政論文字，後來雖然大部分由他自己編入《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三卷中，但在一九五三年台北遠東圖書公司重印《胡適文存》時，他卻親自把整卷的文字全部刪除了。^②

胡適不認為這些政論文字有思想史的意義是頗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的政論純係針對當時的環境而發，結果不但對現實政治沒有帶來什麼重要的影響，而對當時已經高漲的革命浪潮，也毫無

招架之力。他甚至曾經對他的政論自我解嘲說：「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③儘管如此，如果不是純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觀察，我們仍覺得他的談論政治以及他的政治見解，在中國現代史上仍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對瞭解他個人的思想，尤其極為重要。這些言論都很淺顯，也不太涉及艱深的理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可能也不大，但他的態度和對政治問題所採取的解決方式，却正代表中國現代政治發展的另一取向。中國近現代史循著革命的軌道已經運作了幾十年，胡適的漸進改革、「反革命」的路子，在這條革命的大道上，似乎也算得上是一條「歧路」了。回頭來看看這條「歧部」代表著怎麼樣的意義，是這篇文章的另一個目的。當然，要全面檢討胡適的政治見解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也絕不是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我只能將焦點放在《努力週報》的政論文字上，並分析他出來談政治的一些因緣和轉折，不過，我相信其中的意義已經很明白了，因為這正是胡適個人事業的分水嶺，也正是中國現代史發展走向另一個方向的開端，它剛好可以讓我們比較清楚地掌握胡適的政治理念，也剛好可以讓我們對中國現代史的發展略作回顧。

I、「Quo Vadis」（何往）^④

《努力週報》創刊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從這個時候開始，將近一年的時間，胡適主要的心力都投注在談論政治上。《努力》宣布停刊時，胡適雖然覺悟到必須再往思想革新的方向去努力，然後才可以談政治的改革，^⑤但是以後辦《新月月刊》和《獨立評論》，他主要的文字還是在政論上。《努力》的創辦可以說是他生命的一大轉折。這時的胡適，正因文學革命之功而譽滿全國，《中國

哲學史》上卷的出版深受各界矚目，在學術上的聲望可以說正處於高峯，許許多多的人正引領企盼他的《中國哲學史》下卷早日出版，期望他在思想文藝上有進一步的成績，他卻暫時拋開了學術的志業，努力談起政治來。對這麼一個深受各方期待，自己還時時刻刻想在文藝哲學上施展身手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究竟什麼因素誘使他打破「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⁶而毅然決然地走上他的「歧路」？

胡適走上談政治的道路，有他個人對政治的潛在關懷和興趣，也頗因於外在環境的孕育和誘發。在他於一九一〇年赴美留學之前，中國的政治正處於內外交迫的局面，正如所有當時的青少年知識分子一樣，胡適在思想上終不免受政局的激盪，以及革命與立憲論戰的洗禮。他在十四、五歲時讀嚴復所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梁啟超的《新民說》，會讓「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思想，和中國當造「新民」的言論延燒其心血，正是因為對國事敗壞有一層深切的感受。⁷這種由環境所激發出來的政治關懷，在他赴美後有了更進一步的滋長。這時的胡適雖遠處異鄉，却無時無刻不注意國內政局的發展。辛亥革命的爆發，使他首次和政治建立起較深的因緣。其時由於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新政府深感興趣，在原先擔任講演的人應接不暇的情況下，胡適越俎代庖，走上了美國社會的演講台，對美國聽眾做過幾次有關辛亥革命和共和政府的演講。為了準備演說，他對辛亥革命的背景和革命領袖的生平做過一番認真的研究。⁸他從這種公開演講所得到的興味，使他對政治的興趣愈發地濃厚。我們看他的《留學日記》，處處可見他對中國政治問題所發的議論。

在留美中國學生界，他已經以意見領袖的姿態出現。一九一五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事起，留美學生羣情激憤，強烈主張對日開戰，胡適提出不同意見，形成眾矢之的。⁹但是在同時，他對美

國報刊所載不利中國的言論，則立刻投書為祖國辯護，¹¹甚至他對中日交涉事宜的關切，竟至徹夜難眠的地步。¹²這些都說明了中國政治情勢的發展，隨時緊扣住這個異國遊子的心。

在另一方面，他在美國的學業和生活，也使他對政治有更深一層，而且更實際的瞭解。他自己說他在大學的時候，政治經濟的課占去了三分之一的時間。¹³又由於康乃爾大學政治系教授山姆·奧茲(Samuel P. Orth)的引導，他積極投入美國於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六年所舉行的兩次總統大選，除熟讀美國報紙上關於選舉活動的報導，對各報言論加以比較研究外，且曾多次參加當地的政治集會，這些接觸使他的政治知識更為豐富，也使他充分體認美國政治活動中所蘊涵的民主精神。¹⁴除了對美國的政治深感興趣之外，他對國際政治也深切注意。一九一二年，他曾經在中國留學生界發起「政治研究會」的組織，對各國政治制度做過多次的討論。¹⁵在美期間，他是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和國際政策會(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的會員，也參加了各大學非兵主義大同盟(Collegiate League to Combat Militarism) (或譯聯校非兵會)，對它們所舉辦的活動都熱心參與。¹⁶這些都充分說明胡適是個相當注意政治的人，也頗熱中於政治活動(並非參政)。最要緊的是，他在這些政治活動中，絕不居於旁觀者的角色，而是帶著一份濃摯的熱情投入。在美國總統大選的一九一二年全年，他衣上佩帶著支持羅斯福的襟章到處奔走，一九一六年他又佩帶著支持威爾遜的襟章活動。而不管是參加世界學生會總會年會，或是國際政策討論會，他也都把它們看做是重要的聚會。他在《留學日記》中對這種態度有一段精簡的說明：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

附于吾所以為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此種行為，人或嗤之，以為穉氣，其實我頗以此自豪。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16

這種看法，或許多少來自山姆·奧茲的影響，但無論如何，這種態度的養成，使他在回國後終究不能置身於中國政治之外，確是他走上談政治的「歧路」的一大原因。

不過，他這種對政治的興趣，在他拿來和對哲學文學的興趣相權衡後，便成了他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⑰他選擇哲學史做為職業，文學做為娛樂，而終究要從事思想文藝上的努力，當然有許多的因素。文學革命的道路，是他同一班朋友討論文學問題所逼出來的。哲學史的志業，一方面因他對中國古代哲學和宋明理學早有一些底子，一方面因他在中學時代讀梁任公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其中的幾章闕漏，早有補作的野心。⑱在自覺不適於學農，而且在哲學史方面有了新的引導的情況下，很自然地便重拾起對哲學的興趣。

⑲一九一五年五月，在一次新的覺悟下，他決定「屏絕萬事，專治哲學」。⑳他之所以離開綺色佳城，轉往紐約，完全是為了尋哲學的志業。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他成為全校聞人，綺色佳一帶各團體邀約的演說不斷，訪客太多，都不利於做哲學的努力。㉑他的離開感情深厚的綺色佳，正如他決心「屏絕萬事」一樣，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割捨。藏身於百萬人的大城市後，他確實更專注於哲學的努力，但他顯然還不能忘情於政治。我們看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活動，如參加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支持威爾遜競選總統，作國際非攻論文參加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的懸賞徵文，㉒

以及在哥大選政治理論的課作為副修，²³都可以看出他對政治仍然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關懷和興趣。

從某些方面看來，研究政治或體驗政治生活的哲學並不衝突，甚至如政治理論或者非攻思想等等，都可以看做是和哲學相交涉，或可看做是哲學的一部分，它們之間可以說是相互統合的。關於這個問題，我無意在此加強討論。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事實上胡適所真正感興趣的哲學，並不在高深的哲理，而是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學問，我們看他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決定專治哲學的一段話，便可以明白他的用心所在：

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不知此謬想也。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事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惟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吾所不能，人其舍諸？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此吾所擇業也。²⁴

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他的哲學事業完全是建立在對現實社會政治的基本關懷上，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所說的：「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的經國之術。」²⁵正可以對他的哲學事業下最清楚的註腳。更進一步去看，即使他在回國後與陳獨秀等朋友相約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努力於思想文藝的改造工作，其基本關懷也仍是政治社會的，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說：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

孤陋、教育界的沈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²⁶

可見他要努力做文藝思想的革新工作，既是張勳復辟的政治反動事件所刺激出來的，他最後的目標也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環境。李澤厚曾分析新文化運動中啟蒙與救國的糾纏，說：

儘管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伏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啟蒙的目標、文化的改造、傳統的扔棄，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原貌。²⁷

這種特性，在胡適身上尤其可以極清楚地看到，這又說明了胡適的不談政治，和一般自命清高、不願去談政治的人不同，他實在是走迂遠的路去做政治事業。而這也便是他後來終於忍不住要談政治的契機。

只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他對政治有相當濃厚的興趣，終極關懷又是社會政治，何以在回國後要下定決心不談政治，而去走迂遠的路？他對哲學文學的興趣當然可以說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確實認為思想文藝的改造才是政治革新的真正基礎。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寫給許怡蓀的信中，有幾段話最足以表明他在這方面的想法：

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櫻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儻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儻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

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枝秃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明知樹人乃最近遠之圖〔途〕，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儻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²⁸

這種要從社會教育著手，從根本做救國事業的觀念，一方面受到赫胥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和他早年讀梁任公〈新民說〉的經驗有關。他在《四十自述》中曾經引用梁任公〈新民說〉中的話說明他們那一時代的人所受到來自梁任公的震盪和感動：²⁹

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

〔敘論〕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佈新者也。

〔新民議〕

梁任公所強調的，正是從根本改造，自強立國的觀念。這種觀念深深地影響著胡適對國事的看法，他一生都力持從根本做起的信念，這個信念是早在他少年時代便已建立起來了。他很早便了解思想的革新，終將造成政治的大變動。正因如此，他是極早能看出梁的文章對辛亥革命有大貢獻的一人。他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的日記寫道：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

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30

胡適的看法是否公允，我們沒有在此討論的必要，但他認為文字宣傳所造成的思想變革，對政治改造有絕對影響的想法，確是他打定決心從思想文藝下手的最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他始終要辦報紙雜誌的原因。

二、走上「歧路」

胡適在《新青年》時期，始終做到不談政治，也始終珍惜《新青年》做為思想文藝的純粹園地。《新青年》被陳獨秀拿去做為共產運動的刊物後，³¹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適幫朋友辦了《新中國雜誌》，³²也還堅持不談政治，即使在陳獨秀和李大釗所辦的政論週刊《每週評論》上，他所寫的仍不過是小說文藝。陳獨秀於一九一九年六月被捕後，胡適接辦《每週評論》，雖然已有不得不談政治的感覺，³³但事實上他所作有關政治的文章並不多，「問題與主義」論戰中的幾篇文字以及作為「問題與主義」論戰前奏曲的〈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³⁴嚴格說來，也不過是作政論文章的方法論，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只是政論的「導言」。³⁵打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每週評論》被封，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努力週報》創刊，這兩年八個月的時間裏，胡適也始終沒有作政論文章。但這段期間，他已在多處作公開的政治演說了。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他在清華大學演講「廢

止國恥紀念的提議」；八月到十月間，先後在安徽安慶第一中學、上海國語專修學校、北京中國大學三度演講「好政府主義」，³⁶已可見他對政治的言論衝動愈來愈強烈了。這當然有現實上的原因，當時他所處身的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他又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來自舊勢力的挑戰，包括北京政府裏舊官僚對他們的敵意，自然有特別強烈的感受。蔡元培一度因學生運動離開北大，陳獨秀則終究不見容於北京。北大雖是學術校園，但政治力量的滲透始終未歇，尤其是從一九一九年十月起，北大等八校教職員鬧了兩年多的索薪風潮，胡適置身其中，不但看盡了政治的醜現狀，對教育終不免受惡政治的毒蝕，自另有一番新的體認。³⁷事實上，胡適和北大的同人早已向北京政府表達他們對政治現狀的不滿，一九二〇年八月，胡適領銜，和蔣夢麟、陶孟如、王徵、張慰慈、李大釗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廢除一切侵害自由的法律條例，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書信秘密的自由等。在宣言一開頭，他們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却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³⁸這正說明他們已經深刻體認到教育事業和一切事業都不可能脫離政治的影響。

「爭自由的宣言」雖然不是胡適所擬就的，但絕對可以代表他已有不得不談政治的新覺悟。因為宣言甫發表，他便南下採取了更進一步的行動。在上海，他約同陳獨秀邀請各界領袖，包括張東蓀、黃韜之、沈信卿、胡漢民、章行嚴、葉楚傖、朱執信等人和學生會代表，共同討論向北京政府力爭自由的進行事宜，最後組成了「自由同盟」，以「同心協力設定人民在憲法上之絕對自由權，並破除其一切障礙」作為同盟宗旨，宣稱至目的完全達到始行解散。³⁹「自由同盟」的凝聚力量和實際運作究竟如何，我們無法確知；可以推斷的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可能發揮太大的

功能。但這個行動却進一步說明了胡適早就想從政治面做改革現狀的努力。這便是他要創辦《努力週報》，作政論文字的一層因素。一九二二年二月，《努力週報》呈請立案，被北京警察廳駁回，胡適重擬了一份措辭極嚴厲的呈文，並且表示「現在政府不准我辦報，我更不能不辦了」，⁴⁰更可以看出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對他走上「歧路」的影響。

胡適忍不住談政治的另一層更重要的因素，是對當時輿論界的不滿。在一九一九年他接辦《每週評論》時，對輿論界不談安福系的橫行、上海南北和會等等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已頗感不以為然，那時他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幾篇文字，呼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⁴¹正是希望輿論界將目光放在具體的現實政治問題上，尋求解決問題之道。但他的呼籲，並沒有獲得回響。在《每週評論》停刊以後的兩年八個月裏，他一直期待有人出來做討論實際問題的政論事業，但畢竟失望了。他有一段話對自己所以要出來談政治，作了最明白的說明：

……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斯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斯——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和「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⁴²

然則早已對「新輿論界」不滿的胡適，在兩年零八個月中都提不起勁來作政論文章，何以會在兩

年零八個月後才下定決心出來談政治？他所說的「忙與病」，以及捨不得丟了哲學文學的「舊戀」去巴結「新歡」，⁴³當然是原因。但辦《努力週報》時，他的忙與病何嘗有任何改善，他何以又捨得丟了「舊戀」去巴結「新歡」呢？這便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促使他談政治的第三層因素——他的朋友丁文江以及老師杜威對他的影響。

杜威是對胡適一生思想有重大影響的人，他於一九一九年來華講學，一九二一年七月返美。在華期間，胡適與他頗有一些接觸，杜威對胡適從事政論事業未必有重要的影響，但他的一些言論，却對已有言論衝動的胡適具鼓勵作用，杜威離華前夕，曾在公饒場合發表對華的觀感，除肯定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具有新時代的精神外，並希望能有活動的能力、實行的精神。杜威認為倘無活動的能力和實行的精神，縱有新思想也是枉然，他特別指出，理想方面常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就如好政府和好教育的問題，究竟應先造好政治再發展好教育？還是先造好教育再產生好政治？這是循環的問題，永遠解決不了，要想解決，只有下手去實行。⁴⁴這些意見，明顯的是對胡適說的，在此之前，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赴總統府請願，在新華門前遭軍警凶毆，杜威已向胡適表示，這個事件格外凸顯了軍閥和教育的不相容。⁴⁵可見杜威已頗有鼓勵胡適等人必須在政治改革方面下工夫的意思。杜威的臨別贈言正好觸擊到胡適的內心深處。胡適後來作有〈後努力歌〉一首，刊於《努力週報》第四期，正是這個意見的發揮：

「沒有好社會，那有好政府？」

「沒有好政府，那有好社會？」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能有教育？」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不先破壞，如何建設？」

「沒有建設，如何破壞？」

這一套連環，又如何解得開呢？

當年齊國有個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套玉連環，

她提起金椎，一椎搥碎了。

我的朋友們，你也有一個金椎，

叫做「努力」，又叫做「幹」！

你沒有下手處嗎？

從下手處下手！

「幹」的一聲，連環解了！

這是胡適為質疑他談政治的讀者所作的，意在表明談政治不過是尋一下手處，以解開難解的連環結。所以我說杜威在這方面對胡適有鼓勵作用，是因為這種意見，丁文江早就向胡適鼓吹過多次了。

根據胡適的回憶，他和丁文江認識大約在一九一九年丁自歐洲返國後，以後逐漸熟識起來。丁文江對政治問題最為熱中，一向主張在朋友間組織一小團體，來討論政治問題。⁴⁶在他的鼓吹下，他們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組織了「努力會」，最早參加的有胡適、王徵、丁文江、蔣夢麟，以後王雲五、任鴻雋、陳衡哲、朱經農等人亦陸續入會。「努力會」成立的宗旨，一方面是希望會員之間相互幫助，使職掌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則希望藉由他們的力量，促成中國政治的改善和社會的進步。⁴⁷為了要公開批評政治，丁文江最早提議創辦一個週報，於是有《努力週報》的誕生。⁴⁸

丁文江之所以要鼓勵胡適和一班朋友出來談政治，是因為他始終認為中國的政治所以混亂，最大的原因在於有知識、能力和道德的人沒有責任心。只要有少數的優秀人才願意挺身而出，做政治上的努力，便能扭轉局面，他經常批評胡適所持改良政治應從思想文藝下手的主張完全是妄想，因為所有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他認為只有良好的政治才是社會和平改善的必要條件，所以一再呼籲大家「要認定了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⁴⁹丁文江的這些「見解」，在胡適愈來愈受到教育、自由等各方面飽受惡政治侵害的情況下，自然深具說服力，少數「好人」應擔負起責任，且能旋轉乾坤的論調，也

正和胡適的想法相接引。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胡適為任鴻雋送行所作的詩，有一節即說：「救國千萬事，造人（案：指造好人）為最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⁵⁰這樣的想法和丁文江的意思不是很一樣嗎？如前文所述，胡適對政治社會事業原就有熱心參與的夙心，只不過因思想文藝的事業，而不得不捨棄政治，如今受了文江的鼓動，自然便走上談政治的路子。

《努力週報》的創辦和胡適出來談政治，在積極意義上，正是要激發大家一起來關心政治、干涉政治，尤其希望自命清高的「好人」出來做政治事業，以免「壞人」當道，為所欲為。胡適希望打破國人不管事的心理和隔岸觀火的態度，要求國人挺身而出，和惡勢力奮鬥。他為《努力週報》所作的發刊辭〈努力歌〉，前三節正是表達這種理念：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

「我不做，等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是真不可為。

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他更大聲呼籲：「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⁵¹

胡適走上談政治的路，對他個人的哲學事業確實造成了損害。表面上看來，他要從思想文藝上替政治改革造基礎的努力也似乎受挫了，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他所做的，仍是一種思想變革，心理改造的事業。他要打破國人聽天由命、消極畏縮的心理，而提倡一種積極奮鬥、捨我其誰之精神態度。特別是看到國人思想被鼓吹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輿論界所惑時，他更是想藉由他的政論，傳達「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理念。新文化運動中所倡導的是打倒陳腐的古典主義，將孔丘、朱熹的奴隸解放出來，現在他要對付的是淺薄的新典主義，不讓國內又增加一班馬克斯、克洛特金的奴隸。⁵²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出來談政治，可以說並沒有離開他原來的路子太遠，他的目的地更是沒有改變。

三、《努力》談政治

《努力》時期，胡適主要的心力放在政治問題上，在他的政論裏，時而對政府提出解決時局

的建言，時而對政府作為毫不客氣地批判，時而對輿論界大聲疾呼，時而對國人的麻木不仁深致悲歎！儘管他的努力最後失敗了，但從這些文字裏，可看到一個自由主義者不畏不懼的胸懷，也可以看到知其不可為而為的道德勇氣，在這段期間，他所發表的政論文字共約十餘萬言，其中牽涉的問題極為複雜。在這裏，我主要是從他的言論來分析他在這個時期的政治見解，以及其中所蘊涵的精神。⁵³

胡適出來談政治，既然是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的理念，他的政論自然純從具體的政治問題下手，他曾經表示：「我們談政治的方針，事實第一，步驟第二，意見第三。」⁵⁴築基於現實問題，明訂施行步驟，提出興革意見，確實可以代表胡適論政的特色。從他的第一篇政論〈我們的政治主張〉⁵⁵開始，他便意圖引起大家對解決時局問題的關懷和討論，希望匯聚更多的力量，對現狀加以改革。

既然要談政治改革，首先便得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然後朝此目標努力做去。他所懸擬的目標，便是他曾三度演說鼓吹的「好政府」。他認為這個好政府，至少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要能為社會全體謀最大的福利，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發展，並且要有正當的機關對官吏進行監督。⁵⁶從這些意涵看來，胡適的「好政府」似乎無啥新義，而且過於簡單。他自己也說他的「好政府主義」是「平常的、簡單的、淺顯的老生常談」。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他的同意本來就不是要立一個複雜而不易懂的目標，而是要讓大家都明白，都能接受的目標，以使大家能朝共同目標努力。⁵⁷而且，事實上，「好政府主義」原是為了反對當時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而提出的。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胡適對朋友表示：「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

談好政府主義！」⁵⁹可以看出，他的「好政府主義」其實不過是「有政府主義」，亦即肯定政府是必須存在的。他認為無政府主義犯了三個錯誤：(1)因為反對某個政府便反對一切政府，反對某種法律便反對一切法律，犯了論理上的錯誤。(2)無政府主義假定人性是自然向善的，無需引導與規範、約束，犯了心理學上的錯誤。(3)當前一切禍患的形成，實由於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結果還要用無政府主義來補救，犯了事實上的錯誤。胡適因而提出「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作為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所謂「政治的工具主義」，其意義在將政府當做一種人造的工具，是因公眾的需要而存在，是一種有組織、有公共目的的權力。這種權力係透過法律的，在消極方面，它可以免去社會間交互的衝突，在積極方面，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政府的機關若運用得當，乃是督促社會進步，打破社會惰性的惟一利器。他強調政府是社會用來謀最大福利的工具，凡能盡此義務，是好政府，不能盡此義務的是壞政府，妨礙或摧殘社會公共福利的是惡政府。⁶⁰這其實是最平凡無奇的政府觀。胡適的用意，在打破許多國人被無政府主義迷惑的心理，希望大家認定政府的存在是需要的；不但需要政府，而且需要一個好政府，因而共同向好政府的目标而努力，這是他談政治的第一個著眼點。

胡適談政治的第二個著眼點，在於打破當時政治上凡事毫無計畫的大弊病。他在留學時代早已指出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

吾國幾十年的政府，全無主意，全無方針，全無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無有羅盤，不知方向，但能隨風飄泊。這種飄泊(Drift)，最大患。一人犯之，終身無成；一國犯之，終

歸滅亡。⁶⁰

所以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他說：「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在接辦《每週評論》時，他所以寫了那篇〈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一文，對《星期評論》頗為稱許，正是因為《星期評論》發表了〈民國建設的方針主張〉，不像一般輿論界偏向紙上的學說，而是腳踏實地地考察社會問題，提出具體的政策。⁶¹他對孫中山《孫文學說》和《建國大綱》表示稱許，也正是基於孫中山定下了遠大的建國計畫。⁶²他最喜歡引用陸放翁的詩：「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需大疾？」來闡說無計畫的危險，在〈政治與計畫〉一文中，他呼籲黎元洪、顏惠慶等人把應付索薪、發餉、酬勳的事交給附屬官僚，而去鄭重地思考國家的大問題，擬定一個通盤的計畫，然後按照預定的計畫，分期實施。他毫不客氣地說：「沒有計畫的人是不配幹政治的」，那種妄想挨過日子，妄想瞎摸索著一條幸運路子的政府，「我們不要！」

胡適不但一再倡言計畫的重要，更隨著時局的轉變，不斷地提出許多的意見。他對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強調一個和平的原則，不論是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⁶³主張召開南北和會，或是以後主張召開各省會議，⁶⁴甚至他的贊成聯省自治，⁶⁵都走的是和平統一的路子，他向軍閥和國人大聲喊出：「武力統一是不可能的，做這種迷夢的是中國的公賊！」⁶⁶他反對武力、反對戰禍，一方面是基於對中國長期內戰的觀察，認為當時沒有任何一系能以武力統一全國，一方面則是基於自由主義者的人道立場（反戰是自由主義者的重要思想之一），不忍人民受害於戰禍，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直奉兩系劍拔弩張，隨時可能再釀第二次戰禍時，胡適有一段話清楚地表現了他的

這種胸懷：

本年四五月間的奉直戰爭固然是勝敗太不徹底，但我們試問，奉直若再開戰，就能打出一個徹底的結果了嗎？況且人民有什麼罪過，必須要忍受這一回一回的戰禍嗎？即使一時打不起來，而兩方拚命的預備作戰，搜括一切款項，作為軍費，那麼浩大的軍費，也是人民不能長久負擔的。⁶⁷

同年十一月，他主張北京政府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以解決時局時，有一段沈痛的話：

我們在這個沈悶可憐的空氣裏，回轉頭來，看看我們的老百姓受的痛苦，看看我們的無數同胞忍淚吞聲的受痛苦，我們不能不問問自己，究竟有什麼救急的法子沒有？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法子沒有？⁶⁸

也正是基於人道的立場，他後來對孫中山引滇桂軍進入廣東對付陳炯明，頗有一番微詞：「孫氏要報仇，竟至糜爛了廣東，至於今日！」⁶⁹

為了消弭戰禍，減輕人民所受的痛苦和負擔，他不斷地發出裁兵的呼籲，希望政府擬定具體的計畫，剋期實施。他不但在文字上鼓吹裁兵的主張，而且公開呼籲大家加入裁兵示威遊行。⁷⁰而他所主編的《努力週報》，對裁兵事宜的進行，也做過很認真的討論。⁷¹除了主張裁兵，他也主張裁官，因為「現在的官吏實在太多了，國民擔負不起！」⁷²這些都可以看出他對人民飽受惡政治蹂躪的不忍。

胡適雖然主張以和平會議的方式達成全國的統一，但是却堅決反對暗中勾結、私下分贓的機曾。他強調「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⁷³所以不管是南北和會或者各省會

議，都應該在國民的監督下公開地進行。他說：

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來，信使的疏通，那是不負責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為。道理上這種方法是不正當的，事實上這種辦法是很困難的。分贓可用此法，賣國可用此法，謀統一不可用此法。⁷⁴

這個「公開」的原則，同時也必須應用到政府的財政和考試用人等方面。這便是他所要求的「公開的政府」。⁷⁵胡適極為強調政府應把財政的收支實況開誠布公地公布出來。他認為當時的政府並不是沒有錢，之所以會鬧到發不出餉，而引起索薪風潮的原因，全是因為財政不公開，官吏可以自由支配國家收入的結果。他呼籲大家聯合起來，齊心協力地要求政府在財政上要做到「會計公開，統籌支配」八個字，如果做不到，「我們然後一齊罷工，法庭關門，監獄罷工，銀行罷市，以及各機關同時停止。」⁷⁶胡適一向不主張罷工罷市，這可說是他最激烈的政論文字了。

從反對武力統一、主張和平解決時局的立場出發，胡適贊成當時盛極一時的聯省自治。他在〈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一文中指出，中國幅員太大，並不適於中央集權的組織，勉強實行的結果，是為強求統一而封建軍閥，這是軍閥割據的一大原因，他認為只有在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運作下，增加地方的實權，讓地方可以充分發揮它的潛力來和軍閥作戰，才能打倒軍閥。⁷⁷胡適的議論，是針對陳獨秀反對聯省自治的意見⁷⁸而發的。兩人在打倒軍閥的目標上完全一致。他們的根本分歧，在於一主革命，一主和平改革現狀，陳獨秀會私下向胡適明白表示：「中國事無論統一聯治，集權分權，無論民主的政治或社會主義政治，不取革命手段，都只是一場滑稽劇。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⁷⁹他的反聯治論，明顯地是築基於革命的立場。胡適從反對武力統一的

立場出發，認為要達到和平統一的目標，惟有實施聯省自治一途，希望藉由省自治的實現，逐步收回各省武人的軍權，藉由省自治來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藉由聯邦式的統一打破割據的局面。⁸⁰

胡適贊成聯省自治，正如許多的聯治論者一樣，是承認一個無可打破的現狀，而思加以救濟。由於那時候的局勢實在太過混沌，除了南北分裂、各省軍閥割據，「民二」、「民六」、「民八」國會之爭外，又有北京政府的法統問題，直奉的對峙等等，他認為「這種糾紛的問題真是同亂絲一樣，越理越亂，只有『以不了了之』的一個法子。」⁸¹所以他所採取的方式，是從既成事實的現狀，積極謀求問題的解決。他主張黎元洪、顏惠慶的新政府和舊國會議員們拋開「法統」的糾纏，承認黎元洪的新政府是一個「事實上(Defacto)的臨時政府」，以此名義與南方協商統一，而新國會開議後，則應全力貫注於制憲，從憲法上產生一個正式的政府。⁸²這也是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對政治改革所提出的第一個基本要求——建立一個憲政的政府。

胡適的這些主張，在當時可以說完全失敗了。黎元洪的貪戀權勢、吳佩孚對武力統一的執迷，國會議員和北京政客的無恥橫行，無一不將他費盡心血的建言搓成齏粉，到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胡適因病離家往南方休養，結束了他早期的政論事業。《努力》也因「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而走向一個新的方向。到了曹錕賄選成實，胡適鑒於反動政治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談政治改革，已經「止了壁」，遂於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努力週報》75期上宣布停刊。⁸³

胡適結束了他早期的政論事業，可以說是對當時的黑暗政治表達他的抗議。一九二三年一月，蔡元培以「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宣言，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向北

京政府和黑暗政治提出了最深沈的抗議，⁸⁴胡適則以封筆表達了同樣的精神。鑒於一般國民對黑暗政治普遍抱著怯懦姑息的心理，他覺悟到還應多做思想改造的工夫，才可以談政治的改革。⁸⁵

胡適早期的政論事業雖然失敗了，他的政論在許多人眼中或許不值一顧，但他在談政治上所做的努力，所表現出來的積極進取精神，以及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却絕不是許多批評他的人會有的。他談政治，從來不賣弄高深的學理學說，專從具體問題下手，不汲汲於逞一時快意的批評，却費盡心力提出許多建設性的主張。他所傳達的，事實上是一種干涉政治的精神，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說他的文學革命、整理國故，是在建立文化思想界的新「典範」(Paradigm)，⁸⁶他談政治同樣是想建立一個新的「典範」。只是，這一回他並不能引起太多的共鳴，匯聚成更大的力量。在黑暗政治下，更多的人只想接受推翻現狀的革命宣傳，只想去做破壞工作，但是，他雖然失敗了，他所傳達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和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仍是值得肯定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為《人權論集》所寫的〈序〉，有一段話正可以作為他談政治的註腳：

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⁸⁷

四、「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留學時期對美國民主政治的親身體驗和學習，使他對西方式的民主發生極大的興趣和好

感，回國後，自然希望民國能逐漸走上民主憲政的軌道。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所懸擬的目標，如一個能為全民謀福利，保障個人自由、公開的、憲政的政府、和有計畫的政治，其實也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Jerome B. Grieder曾指出，胡適主張「政治的工具主義」，又贊成聯省自治，並沒有發現「政治的工具主義」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力(a strong political power)，而在聯邦組織下，中央政府則需賦予各省相當的自治權，兩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Grieder也認為，胡適所堅持的「一個有計畫的政府」，並沒有民主的概念，相反的，卻有反民主的菁英主義(antidemocratic elitism)的傾向，他對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態度，基本上是屬於知識分子的。⁸⁸這些說法存在著對胡適思想的幾重誤解。

首先，Grieder並未充分瞭解胡適所說的「政治的工具主義」真正的意義。根據胡適自己的說法，所謂的「政治的工具主義」，其實便是一般所說的「干涉主義」，它是針對「放任主義」而生的一種矯正，政治上的放任主義，盛行於一八四八——一八八〇年，其意義有兩層：對內，將政府活動的範圍縮到最小的程度；對外，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任主義施行一段時間後，弊端便出現了。當工人要求政府出面干涉資本人家，要求政府應立法取締工廠和改善勞工待遇的時候，資產階級往往拿自由、平等做為擋箭牌，反對政府立法干涉。鑒於放任主義造成了有力階級壓制無力階級的政治，於是有干涉主義的出現。干涉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將政治機關看做是為人民謀福利的一種重要工具。這個工具，要能保障社會的弱者，限制社會的強暴，維持多數人民的自由和社會的比較的平等。為了避免「干涉」這個字眼引起誤解，胡適才將這種「干涉主義」改稱為「政治

的工具主義」。⁸⁹他的「好政府主義」便是建立在這種「政治的工具主義」上。我們在前文已經簡略提到他的「好政府主義」的一些基本觀念。在這裏，我想進一步指出，他在「好政府主義」的演說中，曾經明白地表示，凡能滿足公共的需要，謀求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便是好政府。不能為所應為，或為所不應為的，便是壞政府。他同時強調，人民不能放任政府為所欲為，必須時常加以監督管束。他說：「政府不良，監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監督，不受修正時，換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這部分；全部不良，拆開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個！」。⁹⁰這都是現代民主政治、民主主義的最基本觀念，它並不需要建立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權力」上。

其次，胡適所以贊成聯省自治，除了認為那是解決時局最有效的辦法外，其目的是希望中國能成為像美國一樣的聯邦國家。他反對地方權限過大的邦聯制(confederation)，認為那實際上是一種「嚴格的分裂」，他甚至不贊成倡言自治的省份，先在省憲中劃定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後，再去制定國憲，而主張將省自治權的部分抽出來，化成一種原則，要求將來中央制憲時應予以承認。⁹¹這也可以看出，他並不贊成各省擁有無限制的自治權，而主張中央仍擁有必要的權力。他的理想政制形態仍是美國的聯邦制，對他來說，美國的聯邦政府正是建立在「政治的工具主義」上的政府，而且很能符合他「好政府」的要求。這中間並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無論是他所嚮往的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其政府在施政時，也都有它的方式與計畫。胡適並不會要求一個專制獨裁政權的計畫政治，我們絲毫看不到他所要求「有計畫的政治」中含有反民主的成分。這便又牽涉到「菁英主義」（余英時譯為「士大夫意識」）的問題。

胡適和丁文江等人呼籲有智識、有能力、有道德的「好人」擔負起改革政治的責任，主要的

用意在於打破「好人」自命清高而讓「壞人」橫行的陋習。丁文江在〈少數人的責任〉演說中，開宗明義強調：「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他從歷史發展的現實基礎上，說明少數有智識、有能力的人往往造成歷史的改變。要政治清明，就得要少數的優秀分子出來組織政府，擔負起政治責任。他同時強調：「平民政治的特色，是在想出一個法子來，一方面使得握政權的人，永久是優秀分子；一方面使得多數人在受少數人支配範圍以內，仍然能夠去監督他們，使他們不敢濫用職權。」⁹²胡適的看法和丁文江相呼應。我們自然可以把它看做是政治上的「菁英主義」，但是如果不希望文生義的話，從其中實在看不出有反民主的意涵。

事實上，胡適所提出的主張，在他的思想裏都能得到調和，他所追求的是一個西方式的民主，一個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究竟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呢？他並沒有採取國民黨的革命手段，更沒有採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手段，而係認定了漸進改革的路子。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他何以不像當時一般關心國事的人一樣走上推翻現狀的革命之路呢？他自己曾經說，他當時對北洋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⁹³這種樂觀的想法，當然也可以是促成他走漸進改革路線的原因。但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說，正由於他在思想上有漸進改革的傾向，才使他願意去期待北洋政府。而他的思想，確是促使他走漸進改革路線的最重要因素。

胡適的政治思想，受墨子、老子、梁啟超、赫胥黎、安吉爾(Norman Angell)和杜威等人的影響；在美留學期間，他也受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洗禮。大抵而言，這些人的思想和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在胡適的思想裏，都可以得到調和，或

者更正確地說，他將這些思想中和他較為接近的部分吸收過來，而重新建構成他的思想。

安吉爾對胡適的影響，主要是他的新和平主義(New pacifism)。胡適自己說他早年因受墨子「非攻」和老子不爭哲學的影響，早有反戰和不抵抗主義的思想。⁹⁴安吉爾的新和平主義，則使他重新認識力量的意義。新和平主義的理論在說明：兩個力量如果發生衝突，最後必然是相互抵銷而形成浪費和無結果，只有息爭合作，才是最經濟的辦法，才能使人類社會和精神文明獲得發展。⁹⁵從杜威的著作裏，胡適也讀到相同的論點。透過安吉爾和杜威，胡適從不抵抗主義轉而接受一種有建設的新觀念，相信法律能使力量作最經濟有效的利用。⁹⁶這其實便是他的「政治的工具主義」的思想基礎。這種新的觀念，和他原有的世界主義觀念相銜接，又可以過渡到國際主義。這便是他所建立起來的思想網絡。它們的共同基礎其實還是反戰的和平主義。他在《努力週報》上一再地反對武力統一，一方面是因為他不認為在當時有實現的可能，一方面則正是反戰思想的發揮。如果進一步來看，國民黨的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在手段上也是尋求武力作為憑藉，用武力來進行對抗，它仍將導致內戰。在當時（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他也不認為能有任何軍事力量可以打倒北洋政府或各地軍閥。他贊成和平會議，贊成聯省自治，正是希望將衝突的力量導引到有效解決的途徑。這種基於和平主義的信念，是他不願走武力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方面，他的漸進改革理念，最受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杜威的實驗主義，把一切學說都看做是待證的假設，而注重具體的問題和當前的環境。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也沒有百世不移的定理，最要緊的是針對環境的需要，找出具體的方法來對付具體的問題。所以，胡適說，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⁹⁷胡適的〈多研究些問

題，少談些主義》，正是這種思想的發揮，他的政論態度也是奠基在這個思想上。杜威的實驗主義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達爾文除指出天下沒有永久不變的真理外，並強調生物的進化，不管自然的演變，或者是人為的選擇，都得經過一點一滴的變異過程，從不可能一蹴可幾。杜威的實驗主義從達爾文的這種觀念出發，所以只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③胡適將這種思想整個接受下來，他有一段話最足以代表他對這種思想的信仰：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④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他並不相信政治社會的問題可以透過武力革命的途徑一下子全部獲得解決。這便是他走漸進改革路線的另一個重要的思想基礎。

從這裏便引出了一個問題：胡適是否不自覺地掉進了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網中，只注意到一點一滴、枝枝節節的小問題，卻反而看不到政治社會的大問題？一九三〇年四月，胡適寫了篇〈我們走那條路？〉發表在《新月月刊》上。⑤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指出當前應該打倒的五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他認為中國應走的路是「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這篇文章刊出後，受到梁漱溟的質疑。梁批評他完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全不觸及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也不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看做第一大仇敵，卻毫無理由地推翻「大革命論」，而平空建立起自覺的改革論。⑥梁漱溟對胡適的質疑，正是當日在革命潮流裏面的人們對胡適的質疑，也還是現在的許多人對胡適的質疑。其中所涉及的，正是胡適和當時許多革命論者不同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梁漱溟所提的中國社會的性質的問題，根本不是胡適所關切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對胡適而言，根本是毫無意義的問題。我們試想，一個空談主義學說的人，怎麼可能對別人拿一種主義來解釋中國的問題，會感到興趣、感到有意義呢？就胡適看來，他們根本上便犯了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的毛病。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中，他說：

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鶴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革命對象。

這正是對馬克斯主義的信徒們的一種批判。所以，在胡適看來，所謂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這些中國共產黨所高喊要打倒的對象，根本便不存在，完全是中共為了共產革命而運用馬克斯的理論造出來的。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軍閥和帝國主義在當時對中國造成大害，是明顯存在的事實，何以胡適不主張打倒呢？

在胡適看來，軍閥的橫行和列強入侵，都是結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說，都是病象而非病根。胡適將軍閥包含在擾亂裏。他認為軍閥是擾亂的產物，二十年來的軍閥鬥爭都是無聊政客挑撥造成的，只有充分養成文治勢力，實施完備的文治制度，才能鎮壓軍閥。¹⁰²這正和他主張用聯省自治來打倒軍閥是同一意義。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在《努力週報》上寫道：「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¹⁰³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問題的思考完全著重在尋根，而帝國主義的問題，在胡適看來根本不存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寫〈國際的中國〉一文，已表示了這樣的看法，他說：

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軌道了，工商業可以自由發達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在軌道上進行了。¹⁰⁴

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中，他從另一個角度述說同樣的觀念：

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

從這裏，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強調的是一個自立自強、培原固本的信念。只要文治勢力強，軍閥自然無法橫行（他曾舉五四學生運動為例），只要中國自己富強，帝國主義自然不能侵略。他向梁漱溟明白表示：「我的主張只是責己而不責人，是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¹⁰⁵這樣的觀念，和我們在前文所說的，他主張「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他早年從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梁任公的《新民說》中得來的觀念，支配了他一生。他始終認為病象的救治惟有從病根下手始克為功，若只是從表象上下工夫，終歸枉然。即使表象果真有所變革，終究還是得回過頭來做根本救治的事業。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努力週報》上寫道：

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有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¹⁰⁶

這樣的見解，絕不是他同時代的革命論者所有的，也絕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而更大的不同還在

於，他早就對中國當日行武力革命所將帶來的後遺症，感到憂心忡忡：

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餒更兇，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¹⁰⁷

尤其是在中國革命過程裏，革命者那種不容異己的敵我對立心態，早已使他擔心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後，中國的社會將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¹⁰⁸從這些觀念的表達上，都可以看出，他反對當日的革命並非由於懼怕羣眾，亦非出諸盲目的情緒反應，而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以更深遠的眼光看到中國當日煽動起來的武力鬥爭，終將給社會人心帶來更大的災難。他雖然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是很艱難的一條路，是很迂緩的一條路，但是，他不認為要真正達到政治改造的目標，會有更簡單容易、更快捷的法子。¹⁰⁹

胡適苦心的呼籲和努力，在大革命的浪潮下完全被淹沒了。那些沈醉在革命的激情裏的人們，滿心相信只要打倒了壞現狀，天堂樂園便在眼前了，誰會去考慮到武力革命所將帶來的災害和深遠影響，誰會有耐心去做那一點一滴的自覺的改革呢？¹¹⁰

胡適漸進改革主張的失敗，並不是他個人所造成的，而是所有急功近利，把革命視為萬靈丹的人們所共同造成的。今天，在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革命動盪歲月之後，在不容忍的肅殺空氣充塞了幾十年之後，在當年譏嘲胡適懼怕人民羣眾的中國共產黨開始鎮壓人民羣眾、開始講求「實事求是」之後，我們回頭看看胡適當年的主張，和中國所走過的路，也許會有另一番新的感受！

註釋

- ①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努力週報》七十五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廿一。
- ② 《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三卷，最早由亞東圖書館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版，一九四一年三月亞東第十版刪除了〈一年半的回顧〉和〈這一週〉短評四則。這些被刪除的文字，內容都涉及孫中山和陳炯明之爭，不知是胡適本人刪除，或是亞東圖書館刪除。台北遠流出版社所出版的《胡適文存》保留了這幾篇，顯然是按較早的版本排印的。
- ③ 胡適：〈這一週〉，《努力》十期，一九二三年三月廿五。
- ④ "Quo Vadis"為波蘭人顯克微支(Henry Sienkiewicz)的著作書名，意為「往那裏去」，有徐炳昶的中譯本，譯為《何往》，胡適曾為此書作序。由於恰與胡適名字有同樣意義，胡適曾以Q作筆名，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字。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一九八五年一月，頁一二六，二〇三。
- ⑤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
- ⑥ 胡適：〈我的歧路〉，《努力》七期，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
- ⑦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一九八〇年十月，頁五六—五九。
- ⑧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以下簡稱《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一九八一年三月，頁三八。
- ⑨ 《胡適留學日記》（以下簡稱《留學日記》），台北，商務，一九五九年三月，頁五六九—五七〇，五七

七，五九一—五九六，六一三。《口述自傳》，頁五九—六一。

10 《留學日記》，頁五七〇—五七五。

11 《留學日記》，頁六二五。《口述自傳》，頁六二。

12 胡適：〈我的歧路〉。

13 《口述自傳》，頁三一—三五。

14 《留學日記》，頁一二一，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一三〇，一三四。

15 參看《留學日記》，頁一三六—一三八，五〇四—五一三，六七—六八四，九五—九五五。《口述自傳》，頁五五—五七，六二—六三。關於胡適留美期間的政治活動，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敘述

頗詳盡。

16 《留學日記》，頁一〇五三—一〇五四。

17 《口述自傳》，頁三六。

18 胡適：《四十自述》，頁六〇—六一。

19 《口述自傳》，頁三八。

20 《留學日記》，頁六五三—六五四。

21 《留學日記》，頁六八五—六八六，七八九。《口述自傳》，頁五三—五四。

22 《留學日記》，頁九五—九五五。

23 《口述自傳》，頁八八。

24 《留學日記》，頁六五三—六五四。

25 《留學日記》，頁一六七。

26 胡適：〈我的歧路〉。

27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一九八七年六月，頁十一—十二。

28 《留學日記》，頁八三二—八三三。另參看頁八二一—八二二「論造因」一則。

29 胡適：《四十自述》，頁五七—五九。

30 《留學日記》，頁一二二。

31 有關《新青年》陣營分裂的討論，可參看張靜廬：〈關於新青年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中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頁七—十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頁一二—一二三。「饒玄同致胡適函」。

32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二九，三五。耿雲志：〈胡適年譜〉，《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三六八。

33 胡適：〈我的歧路〉。

34 全文見《每週評論》十期，一九一九、六、廿九。未收入《胡適文存》。

35 胡適：〈我的歧路〉。

36 《胡適的日記》，頁一七三—一七五，一八六，二四一。

37 《胡適的日記》，頁一三〇—一三一，四三一。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一八九八—一九四九）》，

上海，教育，一九八一年十月，頁一二九——一三一。《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一二九——一三一，〈胡適致范源濂函（稿）〉。

38 《東方雜誌》，十七卷十六號，一九二〇、八、廿五。

39 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〇年八月八、九、十五日，九月十日，《本埠新聞》。

40 《胡適的日記》，頁二五五，二六三。

41 見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台北，遠東，一九五三年十月，頁三四二——三七九。

42 胡適：〈我的歧路〉。

43 同上。

44 《胡適的日記》，頁一一八。

45 同上，頁八三。

46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胡適紀念館，一九七三年二月，頁三二，三五。

47 耿雲志：〈胡適年譜〉，頁三八〇——三八一。

48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三五。

49 同上，頁三五——三六。另參見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努力》六十七期，一九二三、八、廿六。

50 《留學日記》，頁一〇〇六。

51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二期，一九二二、五、十四。

52 胡適：〈我的歧路〉。

53 有關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的政論的相關研究，可參看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73-216。以及張忠棟：〈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胡適五論》，台北，允晨，一九八七年五月，頁一—六五。

54 《胡適的日記》，頁四五—一。

55 〈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原是胡適為《努力週報》而作的，寫成以後，因覺得可用為公開的宣言，才邀同蔡元培等十六人加入，曾經過討論並稍作修改，但主要的內容和意見都是胡適的。其間還因為未邀研究系加入，頗引起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的不快。見《胡適的日記》，頁三五二—三五四。

56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

57 胡適：〈好政府主義〉（北京中國大學演講），《晨報附刊》，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58 《胡適的日記》，頁一〇〇。

59 《胡適的日記》，頁一七三—一七五。胡適：〈好政府主義〉。

60 《留學日記》，頁九六〇—九六一。

61 〈民國建設的方針主張〉一文原刊《星期評論》二號（一九一九、六、十五），胡適在《每週評論》二十八期除發表〈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外，並轉載〈民國建設的方針主張〉全文。

62 胡適：〈孫文學說卷一〉，《每週評論》三十一期，一九一九、七、二十。

63 〈政治與計畫〉刊《努力》七期，一九二二、六、十八。胡適以“V”的筆名發表。

64 參見 W. G. T. (胡適)：〈假如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努力》二〇期，一九二二、九、十七。（此

文即《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中的那篇〈一個平庸的提議——解決目前時局的計畫〉。胡適：〈這一週〉，《努力》二十二期，一九二二、一十、一，胡適：〈我們還主張召集各省會議〉，《努力》二十八期，一九二二、十一、十二。《胡適文存》未收入此文。

65 參見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努力》十九期，一九二二、九、十。

66 胡適：〈這一週〉，《努力》二十二期，一九二二、十、一。

67 W. G. T. (胡適)：〈假如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

68 胡適：〈我們還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69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

70 《胡適的日記》，頁四七九。

71 《努力週報》上關於裁兵計畫的討論，有叔衡：〈廢督裁兵的辦法〉（十三期）；宗淹（丁文江）：〈裁兵計畫的討論〉（十四期）；蔣百里（方震）：〈裁兵計畫的討論（答宗淹）〉（十五期），〈裁兵計畫書提要〉（一六期）。

72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另參見胡適：〈這一週〉短評，《努力》八期，一九二二、六、廿五。

73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

74 胡適：〈這一週〉，《努力》二十二期。胡適：〈我們還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75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

76 胡適：〈大家起來監督財政〉，《努力》三期，一九二二、五、廿一。《胡適文存》未收入此文。

77 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78 見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努力》十八期，一九二二、九、三。

79 《胡適的日記》，頁四六九。

80 胡適：〈吳佩孚與聯省自治〉，《努力》一十五期，一九二二、八、十三。

胡適：〈這一週〉，《努力》十八期。

81 胡適：〈這一週〉，《努力》十四期，一九二二、八、六。

82 胡適：〈這一週〉，《努力》十一期，一九二二、七、十六。

83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

84 胡適：〈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努力》三十八期，一九二三、一、廿一。

85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

8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一九八四年五月，頁一九—二〇。

87 《胡適書評序跋集》，湖南，新華，一九八七年十月，頁四七七。

88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

- 1937, pp. 195-196。

89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胡適文存》，台北，遠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頁三一七—三一九。

90 胡適：〈好政府主義〉《胡適的日記》，頁一七三—一七四。

91 《胡適的日記》，頁三八八，四一三。

92 宗淹（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燕京大學講座），《努力》六十七期，一九二三、八、廿六。

93 胡適：〈一年半的回顧〉。

- 94 《口述自傳》，頁五七—五八。
- 95 《留學日記》，頁六七七—六七八。《口述自傳》，頁六三—六四。
- 96 《口述自傳》，頁六四—六七。
- 97 參看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台北，遠東，一九五三年十月，頁二九一—三四一。胡適譯，高一涵記，〈杜威博士講演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新青年》七卷一號（一九一九、二、一），頁一二七—一三三。
- 98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台北，六藝，一九五三年三月，序，頁三。
- 99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7卷1號，一九一九、十二、一，頁一一—一二。
- 100 胡適在文末所署日期為十九、四、十，而刊載此文的《新月月刊》二卷十號的出版日期記為一九二九、十二、十，恐有錯誤。或者係延期出版。
- 101 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原載《村治》二號，轉載《新月月刊》三卷一期，一九三一、二、一〇，「通訊」欄。
- 102 胡適答覆梁漱溟的信，見《新月月刊》三卷一期，「通訊」欄。
- 103 胡適答伯秋、傅斯稜，《努力》四期，一九二二、五、八。
- 104 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二十二期，一九二二、十、一。
- 105 胡適答覆梁漱溟的信。
- 106 胡適：〈這一週〉，《努力》七期，一九二二、六、十八。
- 107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

⑩ 〈胡適致陳獨秀函（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三六〇。

⑪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參看《留學日記》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論革命」中的英文信，頁八四二—八四三。

⑫ 胡適早已知道人們對迂緩的革命不會有耐心，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寫信給 Professor H. S. Williano 的信中便說：“This is necessarily a very slow process, and mankind is impatient!”見《留學日記》，頁八四三，「論革命」。